

性運 2.0：歷史與當下的雙向運動

王顥中*

摘要

歷史地看待社會運動發展的系譜，晚近 30 年的新社會運動，其共同性的發展基礎，是與前一階段運動框架的決裂：在知識上表現為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在政治上則表現為與徹底且全面的革命決裂。當馬克思主義已「後」、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計畫被宣告「失敗」，皆已成為全球性的某種「共識」，全球秩序的鞏固者與挑戰者，於是暗自共謀了一套價值，即資本主義將恆常不滅，它所派生出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則是時代、理性與善的終點。人們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加磚添瓦地在這個自由—民主秩序的屋簷周邊進行這樣那樣的漏雨補修工程。

台灣在解嚴後快速蓬勃發展至今的新社會運動，如今成為各派社會異議份子的言說起點，即是這個自由—民主秩序的延伸產物。本文指出，1990 年代起風起雲湧，踩穩邊緣立場的性運，要能持續挺進，必須重新面對歷史，面對本地的殖民問題，展開歷史與當下的雙向運動。

關鍵詞：後殖民、性／別政治、雙向運動、中國人、身份、歷史

* 服務單位：苦勞網記者。

E-mail: haozhongwang@gmail.com

Sexuality Movement 2.0: Double Movement of History and Present

Hao-Zhong, Wang^{*}

Abstract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Martial Law.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exuality Movement, which surged from the 1990s as one wing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must face the local colonial history if it expects to advance itself. It is a Movemen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Keywords: postcolonial, gender/sexuality politics, double movement, Chinese, identity, history

^{*} Journalist at Cooloud.

E-mail: haozhongwang@gmail.com

性運 2.0：歷史與當下的雙向運動

王顥中

一、性運前身：「人民民主」的反思

台灣的「性」運脫胎於 1980 年代末的「人民民主」論辯¹，從台灣社會的底層、邊緣形成社會變革的動能。當時台灣社會初面臨解嚴，社會力爆發且快速面臨轉型，舊的黨國管制力道逐漸退潮，而在 1990 年代的民間社會中發展出短暫的自由開放與活力。然而，青黃不接的年代很快過去，以新自由主義為基底的新興治理機制快速替代黨國，掌握社會權控位置，無論是以中小企業、私營資本的黨外—民進黨，或者以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為代表的婦女運動，都很快形成了新的治理模式。脫胎自「人民民主」論辯的性運以及邊緣運動，於是從 1990 年代起持續扮演著攪擾時局、從中作梗的角色至今。

然而，隨著現實具體政治情勢的發展演變，全球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秩序也愈發成功淡化各種包含酷兒在內邊緣運動的諸多尖

¹ 從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持續在台灣社運場域中發揮作用的「人民民主」辯論，由甯應斌、陳光興、吳永毅、丘延亮等人提出，除提倡人民之間的平等結盟外，主張社運應該吸納承載了各種污名的邊緣與偏差主體。（機器戰警，1991）

銳提案，正如同對於西方 1960 年代嬉皮文化大規模遭到收編一般，台灣的治理體制逐漸調適並削弱各種顛覆力量。把台灣近年同性婚姻平權修法的聲浪放在全球同志運動的脈絡下來看，同性婚姻、開放同性戀領養小孩的生命權力治理技術——開放與包容，讓其淨化後加入所謂「正常人」的主流行列中——其實就是這個自由—民主秩序的調適。

上述調適過程，也可以表述為許多性邊緣主體逐漸從秩序的外部被捲入內部。然而，承繼了「人民民主」精神、誓言培力壯大性多元與性偏差等污名主體、拒絕主流收編的性運，何以仍然無法逃離網羅、無法成功避免或阻止被捲入秩序內部？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簡單解釋為是敵人太過強大之故（收編力道太過猛烈）外，我認為還必須探究性運本身過往的歷史的、知識的問題。簡而言之，過去性運的操作場域，往往多數限定在（一）民族國家內部；（二）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秩序（代議體制）中，因此難以形成真正改變現實運作框架本身的政治行動。

作為當年「人民民主」論的倡者之一，甯應斌曾經在二十年後，回頭反思 1990 年代人民民主論述的社運想像：「只設想了在地向下與本土橫向的連結，且自滿於其道德正當性自我成立，應該就是出於缺乏向上接合世界體系的歷史縱深。換句話說，人民民主未必只是欠缺時間歷史的向度，而是我實質地接受了帝國永續的歷史終結論，以致於過去與未來的某種認識論被預先封閉了。」（甯應斌，2014: 162）

無論是人民民主論或者接踵而至的性運，雖以邊緣作為社運正當性的來源以及自身的立足點，過去卻沒能歷史性地反思眼下「中心—邊緣」之構成，只以知識份子所處的一地（台灣）為範圍，展

開一時（當下）之鬥爭。既然如此，隨著政治情勢的轉變，（台灣）民族國家的打造工程漸趨完備，甚至佔據文化領導權的高地，成為各「社運」的潛台詞與大背景，運動自然難以逃脫網羅，成為民族國家與國家秩序的補充，被捲入各種國家機器與措施的改良計畫當中。

與甯應斌一樣在近年著重強調歷史—區域視野的趙剛，其反思對象雖然並非針對「人民民主」，而是更大範圍的台灣左翼社群，但提出的論點也相當接近，批評左翼社群自限於一種以台灣為唯一空間尺度的方法論視野，表現為「歷史的無關」，其實都是建立在「方法論台獨」的基礎上。（趙剛，2016）

因此，重新面對歷史，顯然是下一階段運動最迫切的課題。在更早的一篇文章當中，甯應斌也指出未來人民民主的可能方向，說到：「過去人民民主對於西方批判話語、對於「普世」現代性沒有保持批判距離。這一點不是只涉及運動或政治，而是歷史與思想知識典範的長期轉變。原本人民民主話語竟與歷史無涉——一個去歷史的人民民主話語當然也就無法與西方現代性保持批判距離。故而，實際地說，人民民主必須也需要批判歐洲中心論，重新獲取一種新的（台灣—中國—亞洲—第三世界）區域與歷史視野，這樣才能開展出有別於全球正義的主流話語。」（甯應斌，2012: 123）

二、單線運動（的侷限）

歷史地看待社會運動發展的系譜，晚近 30 年的新社會運動——包含但不限於尊重少數族裔、性別平權、身分認可、環境保護、動物權等等——不僅在西方國家盛行並成為顯學，同時也透過全球

化的效應，擴散至第三世界國家。

這個「新社會運動」的根源及其共同性的發展基礎，是與前一階段運動框架的決裂：在知識上表現為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在政治上則表現為與徹底且全面的革命決裂。當馬克思主義已「後」、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計畫被宣告「失敗」，皆已成為全球性的某種「共識」，全球秩序的鞏固者與挑戰者，於是暗自共謀了一套價值，即資本主義將恆常不滅，它所派生出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則是時代、理性與善的終點。人們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加磚添瓦地在這個自由—民主秩序的屋簷周邊進行這樣那樣的漏雨補修工程。

然而，這樣一種與前一階段左翼傳統的決裂絕非自然而然，它同時也是經歷一個特定的、刻意的政治操作過程所遺留下來的效應，例如，美國 1950 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以及台灣在全球冷戰前緣的白色恐怖屠殺。於是我們只能尷尬的認識到，凡是對於此種決裂不置一詞、樂於或甘於在其基礎之上所從事的「社會運動」，無論其運動的抗議本身內建了如何的進步價值與潛力（族群平權、同志去污名、反核……這些絕對都是重要同時進步的理想），都無法否認它其實也是該政治操作（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的延伸效應之一，或說，是銅板的另一面。

在整體、全面的左翼認識框架的匱乏下，在對於一切「惡性結構的理論性與歷史性探索的『懸置』」（趙剛，2015）之下，各處各式的人們，「只是每個『民族國家』的『社會運動』自掃門前雪，各自對抗各自頭頂上的吸盤，使自己的政府庶幾免於被吸走而已。」（同上引文）並且，社會運動被按照現代政治範疇的劃分，一一編派歸類並予以命名：階級、族群、環境、性別、性……。而早前關於社會整體解放的運動，則在上述命名下，發展為各種「單

線運動」：階級解放、族群解放、性別解放、性解放……（各自對抗頭上的不同吸盤）。這倒不是說，這些「單線運動」彼此必然無關，而是在知識與方法上，他們已經被預先切割開來，然後才分析彼此間交會的效應。近來流行的「交織政治」，正是這種「先切割、再交織」的產物。

從歷史來看，包含「性」運主體（酷兒、同志……）在內，多元迸發的各種新社會運動主體其實正是在晚近資本主義的發展所支撐出的空間中才有機會增生，這個空間的出現，同時見證了過去一世紀以來階級鬥爭的結果，即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秩序在全球範圍都佔據了支配性地位。用齊澤克的話來說，這顯示「人們甚至不能想像對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種可行的選擇——對左派來講，唯一的選擇就是引進國家調控和民主控制。」（齊澤克，2004: 345）

我以下的思考，便是在以上種種粗線條勾勒的廣泛背景之脈絡當中，設想作為關注且投入性運的我們，該如何突圍？如何轉進？以下我希望漸次且扼要地提示幾條彼此互相扣連的可能進路。

三、性／別的國族

「性」作為一個範疇，總是糾葛並相關連於其他社會範疇，這個說法如今已是一個非常通俗的見解，不必多說。一般所謂的交織性：如「性與階級」、「性與種族」……但凡一切「性與 XX」這類提法，把兩種以上範疇並置在一起綜合分析，可說是這種見解的應用。然而，我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在「性」的意涵當中本身就融入了社會差異，換言之，「性」的內涵，是作為其他社會差異的表徵而存在。

丘延亮在替阿席斯·南地 (Ashis Nandy) 《貼身的損友》中譯版作序時，寫到「國族的性別」這麼個概念，例如有父國 (fatherland)、母國 (motherland) 之別。我曾經把這個概念倒轉過來思考：有沒有「性／別的國族」之可能呢？意即，「性／別」這個範疇，不只是「性別」與「性」，不只是男、女、(不)男(不)女、同性戀、異性戀等等。好比說，在匿名交友或者隨機視訊網站上，網民經常會彼此先「自介」，開頭經常介紹的慣例，就是 ASL，其中 A 是年齡 (age)，S 是性別 (sex，有時也泛指 sexual)，L 是地點 (location)。人們就按著這個公式一一答覆。例如，21/男/台灣等等。然而，在 S 的部分，情況往往很複雜，很多人還是會以男／女 (M/F) 來作表示，不過，更多時候，在特定的圈子或談話脈絡中，則會以 gay/bi 以及 LGBT 話語中的其他詞彙來替代，好比說，21/gay/台灣，諸如此類。

問題是，gay/bi 難道就足以描述一個人的性／別了嗎？這讓我想起一個經驗，許久之前某次視訊，對方（一個英國人）劈頭就問我是不是 oriental，據說這個詞在美國有歧視意味而在英國沒有，但總之，就字面上來說，oriental 或許也類似於中文色情片語境下的「亞男」吧。我頓時忽然明白，「亞男」就是我性／別認同與描述的一個必要成分。

在西方酷兒理論脈絡中，例如晚近的「情感轉向」，酷兒理論家賽菊菟 (Eve Kosofsky Sedgwick)，認為對於某些酷兒而言，羞恥情感可視為一種原初性、永久性、結構性的認同事實，其中內蘊著強而有力的自我建設及產生社會質變的可能性。(Sedgwick, 2003: 64-65, 轉引自林純德, 2016: 15) 然而，進一步歷史化這類「羞恥情感」，如果西方酷兒在性／性別／身體羞恥中，尋著了他們翻轉

羞恥的能量來源，那麼對於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同志而言，原初性、結構性的羞恥經驗與認同事實又是什麼呢？我認為，殖民主義語境底下，東方男性被殖民者給女性化（陰柔化），好比說「東亞病夫」的集體印象，本身就是西方國家所未曾經驗、設想到的羞恥經驗，這是為何我要討論「oriental」或「亞男」的緣故，換句話說，在歷史殖民與全球新殖民主義的框架當中，後進國家或次等國家的主體（與身體），無論是被視為不可慾，或者永久處於從屬性、被支配的地位，本身就是底層的「羞恥經驗」，從而也一直存在主體的性／別認同的核心地位。

四、「性」認同的現代構造與認同轉移

香港學者周華山 1997 年在《後殖民同志》一書中，曾寫道：「倘若性取向不一定是每個愛同性的人最重要的身份，那要求她／他們把「性取向」放在生命中首位，而漠視種族、階級、性別、年齡、文化及其他差異，又拒絕處理同志內部千差萬別的權力關係，那可能只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權與性別暴力。」（周華山，1997: 320）

周華山行文的脈絡，是批判西方白人同志解放運動中的文化霸權，並指出這個霸權將自身社群歷史脈絡發展出來的政治與議程排序，普適化為全人類的政治與議程排序，雖然，我不清楚為何他認為這也是一種「性別暴力」的表現，但總的說，我認同國家、區域差異，與伴隨其中的具體歷史條件差異，應該導致各地政治、議程排序的不同。

然而，對於周華山來說，整個「性」(sexuality)——也就是以個

人認同為基調的，把「性（取向）」看成是人構成的根本的這一「側重」——都是十九世紀以來西學東漸，五四運動乃至於西方文化與價值觀殖民支配東方的結果。在那以前，中國傳統文化對同性性事是默言寬容 (1997: 384)，且「同性戀者」(homo-sexual) 的概念根本不相容於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人以『性』來把人分成不同的性人種……只會被描述為一種『行為』……一種『角色』……一種『關係』……一種『風格與時尚』……。」(1997: 327)

《後殖民同志》於 1997 年出版，在周華山當時的訪談中，多數同志並不以中文的「同性戀者」自居，並且在中文世界中，也尚未出現如西方同性戀解放運動範式那般具有廣泛號召力的出櫃（以同性戀者身份認同向社會現身）運動。

如果周華山的分析無誤，那麼，時至 2017 年，不說台灣、香港等前殖民地（直接接受帝國主義殖民，接受殖民統治從上而下「現代化」同時「西化」的地帶），就連在中國大陸，「同志們」都可以各個自稱「LGBT」並以此為認同了，且出櫃運動與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運動，更是愈發興盛。

簡言之，如果過去中國傳統文化是沒有「sexuality」的，現在有了。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如果是殖民的結果，它是如何建構？認同是如何打造？我提出的假設是：在被殖民過程中，一種認同（民族認同）被壓抑，而另一個認同（性認同）被創造，在此交替往返過程中，被壓抑的民族認同於是轉移混合填充成為了「性」認同的構成與內涵（例如，「亞男」、「中國人」、「oriental」……等等）。簡言之，被殖民者的原有的「民族認同」，也就是殖民者所要壓抑、貶抑的那個認同，成為在後來被殖民者「sexuality」構造的一

個重要成分。

這個設想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接合 (articulate) 了性運與民族解放（民族復興）運動的樞紐。過去對於異性戀男人痛恨 CCR（異國戀，日常口語中通常針對用於亞洲女性與白人男性的交往），性／別的批判性論述往往著重於批判異男的性別歧視或者「厭女」情節，卻往往忽略的中國人對白人的反感，背後隱含的是近代以來對西方入侵的記憶與焦慮。問題在於，我們該怎麼轉化或引導這層焦慮，例如對於殖民問題應該批判的是美國（作為帝國）而並非美國人；並且要避免將暴力轉嫁到內部²等等。

五、「雙向運動」

1997 年周華山論述的主要目標，是要解釋為何華人社會當時不曾（尚未）出現如同西方那樣的大規模的「出櫃／現身」運動，然而，當二十年後的今天，中港台皆逐漸紛紛有了以個人身份（性）認同為基礎的出櫃與同志運動，那麼是否可以簡單回頭否認周華山當年提出的理論？

我的答案是「不」，知識除了解釋世界，自然也介入構造世界。例如西方強勢的知識話語，除了被用來解釋全世界的同性性愛（行為），當然也影響了主體的構成（創造認同），因此，我們只能

² 這種源自殖民經驗的焦慮與反感，如果未能妥善引導，往往會催生出其他形式的暴力，並轉嫁到社會內部，例如在台港本地對於 CCR 的討論中，可以廣泛見到各種對於與白人交往的女人的仇視與醜化。本地男人往往指控跨國戀中的女人「崇洋媚外」；而女人則經常援引女性主義或者其它性別批判話語，批評本地男人「厭女」，雙方往往沒有交集。

問，如果周華山所描述的那個「中國文化傳統」已遭截斷，因此在現象上看似已經不存在，那麼是怎樣的「(殖民)現代化」的過程，遮蔽、截斷了它？

又，在當代華人社會的同性戀現象與話語中，仍有許多不同於西方地區的表現，例如與父母、家庭更多的糾葛，中國大陸地區發展出普遍的「形式婚姻」，兼顧個人情慾發展與家庭傳宗接代的要求等模式。這些溢出西方經驗的中國特徵，是否可能提煉出某種中國的原理原則？這是甯應斌「中國作為理論」的知識提案。

針對「文化本質主義」的批評³，我認為問題不在於周華山所描述的「中國傳統文化」內容本身，而是在於，對於周華山而言，他所描述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實在的，是具有內在本質的。卡維波曾以「動態實在論」設想「中國作為理論」，認為建立在「中國特色(模式)」上的豐富細部研究，以及對於現實規律進行抽象化概括的原理原則設定之基礎上，便能「從虛構的建構走向實在」(卡維波，2016: 275)。簡言之，無論是把中國對待性事的觀念、文化，當成是實在的「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是批評其為「文化本質主義」並指出事實不然等反例(例如指出含蓄寬容仍有壓迫效應等)，都仍是停留在將「中國」當成是某種「事實如此」的層次，並沒有將中國理論化。

總而言之，我認為，作為關注且投入「性」運的我們，無論是政治上或者知識上，未來都需要展開一場雙向運動。第一種：是重構或被現代「性」所截斷或消滅的模式或特徵(如：甯應斌近期的

³ 例如劉人鵬、丁乃非(2007)曾以「文化本質主義」界定周華山的「中國傳統文化」說，認為周華山區別了過去的正面性寬容與「現代」的壓抑與恐同現實，作者認為過去遺留下來的含蓄寬容也「陰魂不散」地變形在「現代」中。

「男風／男色」研究，或者周華山論述的「中國傳統文化」；第二種，是在已經被西方中心論所網羅的主體，如當代中國同性戀者身上，挖掘它與「現代」的交合點（例如被殖民民族認同的混合填充入現代 *sexuality* 的構成）。前者是從歷史逼近當下，後者是從當下構思政治與倫理，並且逼近歷史。

藉由這樣的雙向運動，把性運重新置入歷史，以及對惡性結構的理論性與歷史性探索，避免陷入單線運動，或許是性運未來可能的出路。

參考書目

- 卡維波，2016，〈「中國作為理論」之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2 期，頁 227-254。
-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厄尼斯特·拉克勞 (E. Laclau)、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Žižek)，2004，胡大平等譯，《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關於左派的當代對話》，江蘇：江蘇人民。
- 林純德，2016，〈客家「村姑」要進城：台灣客家男同志的認同型塑及其性／別、族群與城鄉的交織展演與政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5 期，頁 1-60。
- 周華山，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
- 甯應斌，2012，〈人民民主：20 年後〉，《人間思想》，第 2 期，頁 115-124。
- 甯應斌，2014，〈人民民主 20 年後的尋思：反公民、反進步、反台灣的知識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94 期，頁 157-179。
- 趙剛，2016，〈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2 期，頁 227-256。
- 趙剛，2015，〈敬答劉紀蕙教授——台灣社會運動真的在創造新的可能性嗎？〉，趙剛、汪暉等著，《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台北：人間，頁 129-148。
- 劉人鵬、丁乃非，2007，〈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著，中

攬：性／別研究室，頁 3-43。

機器戰警（編），1991，《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

Sedgwick, E. K., 2003,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